

可译? 不可译?

——译事难题之我见

聂珂

(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中英文之间的不可译现象分别存在于语言系统、物质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几个方面。人类文化在个性之外的共性,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为不可译性向可译性的转化提供了客观条件。语言系统内的翻译难题,如修辞格,可以借助于其它修辞手法来体现,用一种或多种修辞手法来重塑原文的修辞效果。意译、音译加注、改译及零翻译等方法可以应对其它方面的翻译难题。

关键词 可译性; 文化; 零翻译; 对策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0)05-0118-04

“翻译是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1]。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和文字,就有多少种客观而独特的社会,就有多少种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描述方式。从语言范畴层面来看,当两种语言属于同一语系时,可以找到较多的相同或类似的范畴。反之相同范畴就相对较少,而常常出现范畴空缺。中文和英文就属于这样两个遥遥相望的语系,目的语往往缺少原语文化的所指事物和对应的能指符号,而在双语词典中貌似“对等”而实际上内涵、外延都不对等的词汇也时有发生。正确认识这些不可译现象,将“不可译”转变为“可译”,解决翻译中的种种难题,对于增进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有着深刻的意义。

一、不可译性(Untranslatability)的存在

1. 语言系统中的不可译现象

说起译事难题,某些修辞手法首当其冲。每一种语言都在经历了长期的演变之后,才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发音、词汇、语法、修辞等的体系。这不可避免地导致翻译当中的各种空缺现象,许多修辞手段如双关、拆字、回文等都会造成翻译上的困难。如由于发音或词义方面的对应空缺,原文中的双关到了译文中往往会失去双关的效果。同样的道理,回文的妙趣翻译成英文便会索然无味。

2. 非语言系统中的不可译现象

非语言系统中的不可译现象大致存在于以下两方面。

(1)物质文化方面。在这一方面,不同文化间存在“你有我无”,或“我有你无”的现象。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物质文明上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反映在各自的语言中。如在中国这个烹饪大国,对烹饪手法有着详细的分类。但是到了英语中,“炒、煎、爆、炸”这四种手法基本上用一个词“fry”就可以对付,顶多在前面加上“stir”或“quick”等词以示区别。而“炖、煨、焖、煲”这几种又以“stew”一个词全权代表。这也难怪,没有哪国的饮食文化比得上中国之博大精深。又如,白桦树在俄罗斯人眼中,堪称精神家园。俄罗斯气候寒冷,疆土辽阔,适合白桦树生长,俄语中对白桦树的称呼就有几十种之多,这在其它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词。所以,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本身也造就了翻译上的难题。

(2)社会文化及观念体系方面。某些涉及到思想意识方面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里要么干脆不存在,要么找不到完全的对等语。在许多文章里,“individualism”的对应词是“个人主义”,这就涉及到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individualism”代表的是独立的人格和行为能力,是西方价值观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个人主义”通常指一个人我行我素、自私自利。中国人传统上强调和谐与服从,因此无论在过去还

是现在,“个人主义”都是做为一个贬义词出现的。这样两个内涵大相径庭的词,怎么会等值呢?

二、可译性(Translatability)存在的条件

只要语言和文化差异存在一天,翻译中的困难就一天不会消除。诚然,各区域人类因地理条件和文明程度等差异而形成了语言文字方面的隔膜。事实上,当今世界每天都在进行着无数的翻译活动,不可译性中都包含有相对的可译性,而绝对不可译的也是可以设法解决的,只是有时候解决得不够理想。

更重要的是,文化有个性的同时也具有共性。人类有着基本相同的生存需要和思想感情,因此,有些文化几乎同时发生和存在于不同的地域,这即是不同地域的共同性文化。这种共同性也必然反映在语言之中,使不同的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应或相似成分,从而使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成为可能。比如,“born with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表示一个人出生富贵^[2]。以银器为餐具,一度是西方人家境优越的象征,这不由使人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衔玉而诞”。在谚语和成语方面,我们可以找到不少“神似”的例子。有的是寓意相同,结构不同;有的是寓意相同,修辞方式类似;也有的喻体不同,而语用意义相同。钱钟书的《围城》中的“笑歪了嘴”,被茅国权译为“laugh their heads off”,即是采取了转换形象的译法。从语法结构上看,中英两种语言在篇章结构、段落衔接、论证方法、语言单位等方面都迥然相异,由此导致了“Chinglish”以及翻译中的欧化句现象。而同时,英汉语以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又有着相似的基本框架,即主谓关系和动宾关系。从意识形态而言,中西思维方式及中西哲学范畴有着明显差异,但也是有异有同。如《圣经》劝诫人们“Do as you would be done by”,孔子也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见,在过去缺乏交流的情况下,不同的文化也会有相似的发展轨迹。

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在文化输入与文化输出不断加强的今天,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不同语言 and 文化的“同化”使跨文化交际有了越来越多的可能性。中国文化的价值面临着重建,而西方面临对东方文化的重新发现。由文化的传播和交流而形成的文化大融合,不仅为不可译性向可译性的转化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使之成为现实社会的必需。

三、翻译难题之对策

1. 语言系统内不可译现象之对策

对于技艺高超的双关、头韵、回文等修辞格的翻译,译者首先要端正态度,即承认翻译损失是客观的和正常的现象。这些修辞格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利用了语言中的“巧合”现象,而一种语言中的巧合到了另一种语言中或许就“风马牛不相及”了。“各种语言只为生它养它的社会和人群服务,语言形成之时并未考虑到日后将面对的翻译问题”^[3]。有了这种认识,译者或许不会在遇到问题之初就将其列入“不可译”的范畴,而是试图从相对的不可译性中发掘出一些宝贵的可译性。双关语的翻译确实颇费思量,译者由于受其语言能力的限制,未必都能以“双关”对“双关”。笔者总结出一种更为现实和常用的方法,即对双关形式的补偿法。笔者尽量从语音和词汇层次上找到补偿方法,发现和总结了音韵、比喻、仿拟等方法,而当多种修辞格得到综合运用时,效果往往更胜一筹。

双关语的翻译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修辞法还有好几十种,只要我们用灵活的思路进行多方尝试,就可以尽可能地对原文进行补偿。各种修辞格本身就属于一个大家庭,各有千秋、各放异彩,同时交相辉映、互为衬托。如通用汽车公司萨博(Saab)轿车的广告为“Less is more”,这则广告语的妙处在于用“less”和“more”这一对反义词构成了修辞格中的对照(contrast),给读者以丰富的想象空间。而它的中文更体现了修辞格之间相辅相成的益处,其译文是“越不繁,越不凡。”中文虽然不比原文简练,但它创造了“繁”和“凡”这一对全新的双关语,同样让读者心领神会。不仅各种修辞格可以为双关语所用,而且在对其它修辞格进行处理的时候,双关语同样也可以为别人所用。也就是说,在面对难以翻译的修辞格时,尽量将其置于修辞格这个大家庭中去考虑,用一种或多种修辞手法来重塑原文的修辞效果,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因为在这个大家庭中,修辞格们是可以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

无独有偶,谚语和成语之间也是可以“互通有无”的,如“守株待兔”译为“Waiting for gains without pains”,译者巧妙地改写了“No pains, no gains”这一大家熟悉的谚语,中文读者对“守株待兔”一目了然,而英文读者对“No pains, no gains”耳熟能详,所以原文和译文所达到的语用功能是一样的。翻译的目的是为了沟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

有着相通的思想感情和基本价值取向,这些相通之处就是语言从“不可译”到“可译”的桥梁。

2. 非语言系统内不可译现象之对策

(1)完全意译法。由于中英文化的差异,在翻译中常常不能同时顾及原文的所指意义和丰富内涵,恐怕只能保留其最基本的意义。以中式菜肴的翻译为例,中式菜肴讲究“色,香,味,意,形”,菜肴的名称也是多姿多彩,有不少“写意”菜名,单从菜名上往往看不出原料和烹饪方法。对这种情况,我们多采用完全意译法,如“龙凤会”(stewed snake & chicken),“全家福”(stewed assorted meats),可以看出,这几个菜名的翻译使原文从“写意”走向了“写实”,原料和做法虽如实写出,但原文的文化内涵却不免有所遗漏,如龙和风在中国文化里所具有的高贵的联想意义,“全家福”所蕴含的团圆、吉祥的意义,无法在英译中找到踪迹。此种译法会让原文失去神情韵致,兼顾不了“原作的丰姿”了。但中国饮食文化原本博大精深,如仅仅“写意”,恐怕外国人就摸不着头脑,“写实”虽不是理想之道,却是无奈之举。同样的道理,西方人由于不了解“解放”和当代中国的关系,而对“before the liberation”感到迷惑不解,我们何妨将“解放前”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说法客观地译为“before 1949”? 中国历史之深远,文化内涵之丰富,非异域文化可以匹敌。别说是老外,就是许多文化根底不深的中国人,也难以理解“丝竹”(ancient musical instrument),“白衣”(ordinary people),“拙荆”(my wife),“桑梓”(hometown)等词,如此说来,意译法恐怕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2)音译加注解法。这种方法常用于“彼方无”的情况下,即译语中缺乏与原语相对应的词汇,即便有,也存在意义上的非对应。如中国人的“字”和“号”,就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中国人对取名很有讲究,“字”由名演化而来,“名之与字,义相比附”,就是古人取名的依据。在传统中国,对人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因而常以字代之。“字”因其“尊”意,而被译为“Zi, the courtesy name”,有时又因其“雅”意,被译为“Zi, the literary name”。“号”是正名以外的美称和自称,被译为“Hao, the pen-name”。众所周知,《红楼梦》是“暗示的海洋”,通过人名谐音表达寓意,在杨戴合译本中,人名一律采用音译加注解法,如“甄士隐”译为“Chen Shih-yin, homophone for ‘rue facts concealed’”。关于难以解决的“龙”的翻译,有人提议以“Long, the Chinese totem”为新译法。笔者以为这种另起炉灶不失为一种可取的

方法,一方面保留了“龙”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对其内涵的解释有助于消除西方读者原有的心理定势,看清此“龙”非彼“dragon”,从而回归正确的认识。

(3)改译法。在译语中有时可以找到与原文对应的词汇,但这相应的对等词恰恰又不符合译文语言运用的习惯,容易使读者产生误会,或不能接受原文的真实概念,改写法就用于这种情况。改写法应力求与原文保持较近的距离,而不会让原文有太多改动。中英文中存在不少意义相似而喻体不同的谚语,只需改换比喻形象,以顺应译语文化和译文读者的思维模式,其核心在于用译语文化替代源语文化。如“as stubborn as a mule”可以译为“犟得像头驴”,“as strong as a horse”译为“壮得像头牛”。David Hawkes 在翻译《红楼梦》中的“怡红院”时,舍弃“红”而改为“绿”,译为“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刚好对应了怡红院中“怡红快绿”的匾额。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喜庆和吉祥,而在西方文化中意味着暴力和流血,Hawkes 此举是变通手法,以符合译文读者对色彩的联想。“亚洲四小龙”译为“亚洲四小虎”(the four tigers)也是为了避免英语读者对“龙”的贬义联想而采取的曲折手法,用“虎”来形容这几个经济生机勃勃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达到与原文同样的语用效果。

(4)零翻译。尽管“一种语言能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相对精确地表达出来”^[4],但有些差异按常规翻译已到了不可译的地步,“零翻译”的适时出现,“既提供了克服语言差异的翻译手段,又维护了可译性的普遍原则”^[5]。总的说来,零翻译包括省译、音译和移译。省译法包括对某些冠词、人称代词、量词等的省去,目的是让译语符合相关的句法结构。音译和移译则是当今翻译中运用颇多且影响较大的译法,相当多的舶来语都是来源于这两种译法。如现在时常在新闻中出现的“欧佩克”一词,在其出现之初,也未曾逃过非议。陈中绳曾在 20 年前撰文说:“读了颇有骨鲠在喉之感,此风不可或长。这种译法,与其说是改进,不如说是改退。”^[6]事实证明,这种译法有着顽强的生命力,类似的例子还有“秀”(show),“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博客”(blog)等,不胜枚举。移译是将原语中的词汇直接移植到译语中,如“IT、WTO、CD、IP、IBM、PK”等,而且这些词汇的数量日益呈现上升趋势。这些外来语的引进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表现出某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特征,是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其命运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而是

取决于语言的社会环境。

(5)硬译法。“黄页”(yellow page)一词是英语国家对城市电话簿的称呼,因其黄色的外观而得名,而多年前,不少国人最初将这个词想当然地等同于“黄色书籍”。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黄页”不仅逆流而上地生存了下来,而且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工具。2007年中国教育部公布了171条汉语新词,其中不少是“硬译”过来的新词,政治类中有“监控门”等。自从美国的“伊朗门”事件以来,以“门”代指某种丑闻已是屡见不鲜,网络上某某“门”的运用更是达到了泛滥的地步。而此词被舶来之时,无数人对它心生茫然,暗自揣测此“门”是否彼“门”?“一些不可译的文字在初次翻译时,必然带有某种强制性,所谓强制性就是引入新观念和新概念”^[3]。这些最初令人费解的词语就这样“强制性”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而人们的可接受性是动态的,会随着文化传播和交流程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些“硬译”的词语逐渐被人们消化和吸收,逐渐成为了目的语的一部分。中文里的“功夫”(Kongfu)、“关系”(Guanxi)等词也是这样保留原文的拼音模式而翻译到英语中的。如果对这些词一开始就坚持意译,可以想见,不同的读者脑海中会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图式,造成实际理解上的千差万别;倒不如保留其原汁原味,让读者的理解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步完善。这种不带任何解释性质的“翻译”并不会影

响读者最终理解的准确性,硬译法在破解翻译顽症方面有其独到的力量,仍将继续生存下去。

四、结 语

语言的不可译性是变化和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昔日不可译者,今时却可译;于斯人不可译者,于彼人也许可译。”^[7]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促进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应是大势所趋。在经济和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不同文化处于不断的碰撞和交流中,将华夏文化传播到海外,将西方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翻译作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必将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陈宏薇. 新实用汉译英教程[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1-3.
- [2] LARRY A S, RICHARD E P.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76:54-55.
- [3] 张成柱. 不可译性的存在与转化[J]. 中国翻译, 1988(3): 7-10.
- [4] WAARD J D, EUGENE A N.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M]. Nashville: Cameden and New York: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 1986: 23-25.
- [5] 邱懋如. 可译性及零翻译[J]. 中国翻译, 2001(1): 25-27.
- [6] 安秉哲. “欧佩克”要不得吗? [J]. 中国翻译, 1988(4): 50-51.
- [7] 杨自俭. 英汉语比较与翻译[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187-189.

Translatable or Untranslatable?

——Ways to Overcome Barriers in Translation

NIE K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Untranslatability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lies in such aspects as linguistic system,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culture. The fact that human cultures have more in common than disparities and their integration helps with its transformation to translatability. The code of “all for one and one for all” is employed to deal with problems in linguistic system. The functions of one rhetoric device may be conveyed by another device or the combination of several. Free translation, transliteration with notes, zero translation, etc. prove effective in other aspects.

Key words translatability; culture; zero translation; solutions

(责任编辑:陈万红)